

西方国家政策趋同理论研究述评

向玉琼*

【摘要】关于政策趋同的研究是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目前已得到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学者的持续关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西方学术界涌现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文献，但我国学术界却长期忽视了对政策趋同这一领域的研究，而且对西方研究成果的引进和介绍都非常不足。论文从政策趋同内涵的界定、政策趋同与其他概念的辨析、政策趋同的类型以及政策趋同的影响因素等方面对西方文献研究进行综述、评价，并分析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西方国家 政策趋同 政策移植 趋同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12)01-0145-36

关于公共政策的比较研究是西方政策科学领域具有悠久传统的一个研究领域，其中政策的日渐相似性问题引起了诸多关注，这就是政策趋同（policy convergence）。政策趋同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已成为最热门的研究主题之一。对于政策趋同的研究起初是在美国盛行，后来这种意识逐渐渗入欧洲国家，以至于豪利特（Michael Howlett）在2000年将政策趋同描述为“比较政策研究所阐述的中心问题之一”（Howlett, 2000）。研究焦点^①

* 向玉琼，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10YJC630294）。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① 可参见关于政策趋同的相关文献，如Bennett, 1991；Drezner, 2001；Heichel et al., 2005；Knill, 2005。

包括政策趋同的内涵、国家间趋同的发生及潜在原因、国家间是否会发展出相似的政策,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政策趋同的基本路径有哪些,等等。本文围绕政策趋同的内涵辨析、政策趋同的影响因素以及政策趋同的解释框架这三个方面进行理论综述,阐述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并结合中国实际作出评价,以推动我国政策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政策趋同的内涵

(一) 政策趋同的概念

不同的思想学派都使用“趋同”这一词。他们来自不同学术背景,应用不同的理论研究方法与概念,出现了多样化的解释变量。克尔(Clark Kerr)对趋同的界定得到普遍认同,即“社会变得越来越类似的趋势,在结构、过程和绩效方面相似性的增长”(Kerr, 1983)。趋同涵义丰富,包括社会趋同、体制趋同等。本文关注比“社会趋同”低一层次的问题,仅考虑“政策趋同”这一更为具体的概念。政策趋同这一观点是随着比较公共政策的次级领域的出现演化而来的。

具体到政策趋同的概念,贝内特(Bennett, 1991)认为政策趋同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相似的现存状态。“趋同意味着从不同的位置移向某一共同点。国家间具有相似性,并不能告诉我们关于趋同的任何东西。趋同必须要有一段时间内朝向共同点的运动。”因此,在比较研究中,关键的理论维度是时间而非空间。贝内特的这一定义被广泛引用。而尼尔(Knill, 2005)给出了含义更为丰富的概念:他认为,政策趋同的通用概念是不同政治辖区(包括超国家机构、民族国家、区域、地区政府)之间某一政策一个或多个特征(例如,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环境)之间相似性的增加。政策趋同描述了一段时间内政策朝向某一共同点的变化过程,而不管其因果程序是什么。可见,关于政策趋同的内涵界定,都认可政策趋同是一个朝向共同点的变化过程,这突破了类似政策的简单静态考察,赋予了政策趋同的动态意蕴。尼尔的概念区分了政策总体与某一特征的相似,实际上这是应用了贝内特的分类,下文会详述。

（二）政策趋同的内涵

具体到对政策趋同内涵的理解，贝内特认为“公共政策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现象”，因此“精确的确定政策与跨国同类政策比较的维度是至关重要的”（Bennett, 1991）。贝内特认为只要以下五个维度任何一个存在，就意味着出现了政策趋同：第一，在政策目标的重合，出于处理相同政策问题的动机；第二，政策内容趋同，指政府政策章程、行政法规、规则、法院决定等方面日益正式的显现；第三，政策工具的类似，即用于执行政策的工具，不论是行政的、立法的还是司法的政策；第四，政策产出、影响与结果的趋同，及执行结果的类似（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有无效果）；最后，政策风格类似，这是指称政策结果形成过程更为松散的概念（是一致同意还是充满争执，是渐进的还是理性设计的，是前瞻性的还是反应性的，是法团主义的还是多元主义的）（Bennett, 1991）。这里，贝内特从不同政策维度来分析其趋同性，这种划分有助于更精确地进行比较进而判定政策趋同是否发生，使得政策趋同的衡量更具操作性，这种划分在后来的经验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到。一些经验分析严格区分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工具、政策产出以及政策形式，他们调查了这些政策范畴中的一个或更多方面的政策趋同的发生与程度。如科尔曼与葛朗特（Coleman & Grant, 1998）分别分析了政策内容、政策工具以及政策产出的趋同，而科尔曼在之前对金融规制的比较研究中仅关注政策形式（Coleman, 1994）。列弗金克与乔丹（Liefferink & Jordan, 2002）在分析欧盟成员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时区分了在政策内容、政策结构、政策形式与政策工具各维度上的趋同。

但贝内特同时也认识到，这种区分几乎不能代表划分明确的分析类型。因为这种区分倾向于将政策制定撕裂为机械的和线性的阶段，可能对于反馈信息的转换与互动过程不敏感，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来界定政策内容。另外，在比较分析中，不同政府采用的政策经常不适用于同一概念范畴。布里克曼（Brickman, et al., 1985: 30）及其同事在化学产品规制中早发现了这一点：一国立法对应于另一国家的行政行为。一个国家是以法院作为决策中的一个持久角色，这一点在其他国家没有见过。法规产出的形式在一些国家是法律化的规则，而在另一些国家是工业与政府之间非正式的协议。在经验研究中，政策要素的比较可能不那么精确，

由于无法精确划分不同的维度，许多经验研究对“政策”总体进行分析，这就导致研究结果的质量与可比性由于政策维度的不精确性而受到损害。另外，这种不同维度的趋同比较有时也给研究结论提出难题，如海歇尔（Stephan Heichel）指出，如果一项研究发现政策领域的总体趋同，而另一项研究显示政策内容与政策目标的趋同但是政策形式与政策工具却有多样性，那么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在政策内容趋同与政策工具趋同之间，如何判断哪一个趋同程度更高？（Heichel et al. , 2005）

霍尔兹因格尔与尼尔（Holzinger & Knill, 2005）从经验研究层面对贝内特所提出的五项维度进行了补充，认为在评判政策趋同时应考虑多样化的因素，不仅包括政策趋同的程度，而且应该考虑其范围与方向。趋同程度是指一段时间内多样化的减少，表现为在时间 t_1 与 t_2 之间标准差的下降。趋同的方向是指在时间 t_1 与 t_2 之间趋同是否与平均值的向上或者向下的移动相吻合。在顶端或者底部的趋同都意味着标准差的下降与平均值的变化。如表 1 所示，在时间 t_1 与 t_2 之间对政策的比较产生了高度不一致的结果。趋同的方向通常与国家干预的程度或者规章的严格程度有关。宽松的标准或者自由化政策被认定处于底部，而严格的标准或者干预主义政策位于顶端（Drezner, 2001）。趋同的范围与受到一定趋同机制影响的国家与政策的数量正相关，参考依据就是研究中国家与政策的数量。趋同程度与趋同范围之间没有直接关联，虽然经常会出现趋同国家数量的上升降低国家间的多样性，但也有相反的事例出现。关于政策趋同的各项指标可见下表。

表 1 趋同指标的潜在配置

标准差	规章平均值	解释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规章多样性与层次维持原状
	向上或者向下移动	没有趋同或者多样化，在相同的方向上运行
下降	没有变化	趋同，但在规章层次上持续
	向上或者向下移动	在顶端或者底部的趋同
上升	没有变化	多样化，但在规章层次上延续
	向上或者向下移动	多样化，但在相同的方向上共同运行

资料来源：Holzinger & Knill, 2005。

表 2 政策趋同的指标

指标	研究问题	参考点	运行
趋同程度	在一定的时间段相似性提高了多少?	一定机制影响的国家与政策的分组	标准差的下降
趋同方向	朝向哪种方向(规章平均值的向上或者向下移动)?	一定机制影响的国家与政策的分组	平均值变化
趋同范围	多少国家与政策以及哪些国家和政策趋同?	调查的所有国家与政策	国家与政策数量

资料来源: Holzinger & Knill, 2005。

可见,霍尔兹因格尔与尼尔虽然拓展了贝内特所界定的政策趋同的内涵,但我们也会发现,他们所设定的这些指标与其说是对政策趋同的理解,不如说是衡量政策趋同的操作性指标。这可能也是政策趋同研究的缺陷所在。正如西利格(Seeliger, 1996)所言,关于政策趋同的研究重点都放在了经验结论的展示上,而缺乏了系统的理论建构。但贝内特、霍尔兹因格尔与尼尔的研究都加深了政策趋同的理解,特别是为判断政策趋同是否发生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方法。

二、政策趋同与相关概念辨析

政策趋同是比较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经常与同构(isomorphism)、政策移植(policy transfer)以及政策扩散(policy diffusion)等概念混用。而这些概念虽然与政策趋同相关,但不完全等同,并不意味着必须一起或者可以混合使用。政策趋同的经验与理论评估常常因为这些不同但又部分重叠的概念而受到损害。

(一) 政策移植、政策扩散与政策趋同

关于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辨析。如纽马克(Newmark, 2002)区分了这几个概念在层次上的差异,认为政策扩散与政策趋同是指称政策传播的最为广义的概念,内含政策移植和教训吸取,包括了结构化政

策的发展与政策复制的具体案例。政策移植总是涉及扩散；然而扩散并不必然意味着政策移植。政策趋同总是存在政策扩散，但政策扩散也可能带来政策趋同的反面，即政策多样化。政策移植则必然意味着政策趋同的发生。如纽马克所建立的扩散连续统（图1）。



图1 政策扩散系统

资料来源：Newmark，2002。

纽马克将政策移植与政策扩散看作范畴不同的概念，而斯通（Stone，1999）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政策移植是一个包含扩散、强制与自愿的教训吸取活动的更宽泛的概念，这是关于政策移植与政策扩散的层次之争。而另一种观点则占研究文献的绝大多数：不考虑政策移植与政策扩散的范畴大小，从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去探讨其相互关系^①。本文也主要从概念内涵上对三者进行辨析。

首先是政策移植与政策扩散的关系。政策移植是“某一政治系统中（包括过去的或者现在的）政策、行政安排、制度与观念被用在另一政治系统中政策、行政安排、制度与观念的发展过程中”（Dolowitz & Marsh，1996）。从多罗维茨与马什的定义来看，政策移植更为关注过程而非结果，这一过程可能，但不必然带来政策趋同。政策移植不仅限于模仿其他国家的政策，而且包括在互动政策内容上的潜在变化^②。

政策扩散的第一种概念与政策移植类似，指称可能导致日益增多的政策类似的过程（而非结果），由此带来政策趋同（Elkins & Simmons，2005）。扩散被界定为“创新通过一段时间，经由特定的渠道，在某一社会团体的成员中传播

① 如 Braun & Gilardi，2006；Marsha & Sharman，2009；Knill，2005 等。

② 如 Kern，et al.，2000；Rose，1991。

的过程。它是特殊类型的传播，所含信息与新观念有关”（罗杰斯，2002：5）。扩散研究始于对一定政策创新采纳模式的描述，不仅限于具体调解机制的运作，而且包括各种影响渠道，从已经在国际系统中交流过的政策模式的自愿采纳（这种模式中扩散过程由于国际条约或者超国家规则中所规定的一致性要求而启动），到通过外部主体对其他国家政策的强加。而另一种概念采用一个狭义的视角，认为政策移植严格限于自愿政策移植的过程。^①由此，政策扩散被看做驱动政策趋同的直接原因，而不是受到多种渠道（包括自愿与强制）影响的运作过程。

由此我们面临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扩散的概念。一方面，这一概念描述了国家间传播政策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带来国家间政策趋同，而不论驱动因素是什么（例如：管制竞争、国家间的一致性、强制）。另一方面，扩散被认为是通过对政策模式的自愿移植而导致政策趋同的明显的因果因素，不包括义务移植或者强制移植。本文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支持扩散，即认为扩散是一个由多方面因素所引发的过程。

很明显，政策扩散与政策移植二者存在差异。扩散研究开始于总体视角，而政策移植分析考察政策交流过程的深层原因和内容。扩散过程中的因变量指称政治系统内部或者之间创新扩散的具有特色的总体模式。扩散文献更多地关注特点采纳模型中的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原因，而移植文献则更多地是强调主体。扩散文献研究经常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而移植研究则更多是依赖于有限数量的案例进行定性分析（Marsha & Sharman，2009）。但这些差异并不表明政策移植与政策扩散之间的差异不可跨越，相反，正如玛莎与沙曼（Marsha & Sharman，2009）所言，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是互动的和具有重合之处的。政策扩散与政策移植持有共同的假设，认为政府不是随意对某一政策实践开展学习，而是通过共同的背景、协商以及组织成员关系来完成（Simmons & Elkins，2004），因此移植与扩散过程要求决策者知晓其他地方的政策选择，由此，扩散经常被等同于政策移植。另一方面，相对于政策趋同的效果视角，政策移植与政策扩散都是关注过程，只

① 如 Kern, et al., 2000; Busch & Jorgens, 2005。

是二者所偏重的视角存在差异。

政策移植、政策扩散与政策趋同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第一，差异存在于深藏的分析焦点。扩散与移植关注过程模式，趋同研究更为关注效果。移植与扩散反映在某一特定环境中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导致政策趋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益趋同的政策必然是扩散或者移植的结果。事实上，也会存在各政治辖区对相对独立的政治事件作出类似的反应而导致政策趋同的现象。第二，概念在其因变量上存在差异。趋同研究寻求解释一段时间内政策相似的变化，相反，移植研究探讨政策移植的内容与过程，而扩散研究主要解释一段时间内的采纳模式。

（二）同构与政策趋同

政策趋同研究蕴含的独特视角使之与组织社会学中发展的同构这一概念非常类似。同构被定义为同化的过程，“迫使一个单元模仿面临同样环境的其他单元的做法”（DiMaggio & Powell, 1991）。同构的中心问题在于一段时间内组织之间越来越相似的机制。由此，政策趋同与同构之间存在很大的重叠，两个概念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经验关注点的差别。同构研究的文献关注组织或制度结构与文化之间的日益增加的相似性，相反，对政策趋同、政策移植或扩散的研究关注国家政策特性的变化。概念之间的差异详见表3。

表3 政策趋同与相关概念

	政策趋同	同构	政策移植	政策扩散
分析视角	效果	效果	过程	过程
经验视角	政策特征	组织结构	政策特征	政策特征
因变量	相似性	相似性	移植内容与移植过程	采纳模式

资料来源：Knill, 2005。

三、政策趋同的类型

评价政策趋同的基本路径是分析一段时间内不同国家政策变得越来越相似的程度。根据评估政策趋同的标准,即分析不同国家政策变得越来越类似的维度,可将政策趋同划分为四种类型: σ 趋同、 β 趋同、 γ 趋同和 δ 趋同 (Knill, 2005)。海歇尔等在对政策趋同进行经验研究的回顾时也进一步阐述了评价趋同的这四种基本路径 (Heichel et al., 2005)。

(一) 共同增长的 σ 趋同

这是一种最普遍的趋同类型。不同国家政策多样性下降而出现的政策趋同就是 σ 趋同,这个命名来自于多样性的代数符号。在这一经典形式中,多样性系数(也称之为分散指数)的下降意味着趋同。如果平均数的变化增加了, σ 趋同可与所谓的“跑向底部/顶部”结合起来^①。这种方法多出现在经济全球化发挥着主导作用的领域。关于 σ 趋同的经典理解可延伸到相似的测量,如欧几里德距离^②,基尼系数^③,或者分析国家政策的扩散近似值。对于测量政策或规制工具的相似性的研究,作为共同增长的 σ 趋同也是基本逻辑。这对于扩散文献研究同样适用,观念、工具以及组织形式的传播在采纳比例里显示出来,意味着相同的程度^④。

σ 趋同除了应用在定量研究领域,在定性研究中也适用,但界定相似性的不那么正式的途径使定性研究很难确定趋同的模式以及与其他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定性研究在测量上的缺陷加上在案例选择时可能出现的偏见都会导致对趋同的不当估计。不过,由于其开放式设计,它们弥补了定量方法的缺憾。

① 如 Gornick & Meyers, 2001; Montanari, 2001; Wolf, 2002。

② 如 Saint - Arnaud & Bernard, 2003。

③ 如 Gemmell & Kneller, 2002。

④ 如 Brooks, 2004; Castro & McNamara, 2003; Kern, et al., 2000; Meseguer, 2003; Tews, et al., 2003; True & Mintrom, 2001。

（二）赶超的 β 趋同

β 趋同意味着落后国家经过一段时间赶上先进国家，这意味着前者比后者更快更具有根本性地增强了其规制标准。当贫穷的经济体比富有经济体发展更快时就发生了 β 趋同，它命名于增长系数。 β 趋同通常与 σ 趋同一起发生，因为“共同增长”预先假定了 β 趋同中的赶超过程。然而，两者之间存在差别，例如高度 β 趋同导致多样性的微小下降时^①。另外，赶超可能包括超越，这样出现了更大的差异。

在移民政策中，从经济分析转变到分析政策落后者与先驱者的背景的案例显示出这套逻辑对政策分析具有重大的贡献。当以前宽松国家趋紧的收容规章比以前严厉的国家程度更大更快速时，就发生了 β 趋同。分析趋同的速度的可能性使得这一过程非常有意思。然而，它需要可测量的时间序列数据，仅能找到少量应用。在定性研究中，这种方法作用较小，虽然一些研究也努力去评估速度 (Coleman, 1994)。

（三）流动的 γ 趋同

γ 趋同发生于针对某一政策而言国家评级的变化。 γ 趋同比较不同时间点国家的排序来分析国家的流动性。如果一个国家在第一次排序中落后了，而过了一段时间赶上来了，则发生了 γ 趋同。 γ 趋同为研究政策趋同增添了新的视角。如果国家的排序是稳定的，或者经过一段时间排序变化了，很明显，这在揭示 σ 趋同与 β 趋同时是重要的。另一方面， γ 趋同发生于当其他的路径无法觉察到变化时。例如，国家排序在跨国多样性没有出现较大下降，或者典范政策模型没有近似的做法时也可能变化。虽然 γ 趋同研究不是普遍现象，但它代表了政策研究中一个很有潜力的工具，这种比较序列分类的观念也可应用于定性研究设计中。

（四）与典范模式距离缩小的 δ 趋同

以上讨论了传统经济趋同分析的主要分类，但很多研究仍然无法被归类。它

^① 参见 Ganghof, 2004: 21。

们的共同点是它们通向趋同的路径是基于与典范模式距离的缩短，例如，由国际组织或者先进国家所促进的模式。基于“距离”的代数意义，我们将这种类别称之为 δ 趋同。从经验上看， σ 趋同与 δ 趋同经常同时发生。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模式大致相似，它们之间的差异很明显就下降了，但如果政策同步趋近典范模式而没有变得越来越相似，则不会出现 δ 趋同。由于 σ 趋同并非必须导向一个既定的模式，距离缩小构成了趋同的另一种逻辑。

在这几种不同的趋同类型中， σ 趋同并不必然意味着存在 γ 趋同或者 δ 型趋同。另外， β 趋同并不必然意味着出现了 σ 趋同，事实上，落后国家比先进国家作出更为根本性的改变不是国家之间差异性减少的充分条件。

四、政策趋同的影响因素

总体而言，国家间的政策趋同有两类解释框架：（1）导致不同国家之间政策趋同的因果机制；（2）使得这些机制发生效应的影响因素。

（一）政策趋同的因果机制

虽然关于因果机制的文献存在较大的重叠，但还是能看出其分散性。一些学者列举了影响机制，也有学者对这些机制进行了分类。例如，霍贝格（Hoberg，2001）将国内问题的压力、模仿、国际法律约束以及国际经济整合并列为驱动趋同的影响因素；贝内特认为趋同的原因是模仿、精英网络、一体化与渗透（Bennett，1991）；西蒙斯与埃尔金斯（Simmons & Elkins，2004）将扩散机制区分为三种：直接经济竞争、信息网络，以及社会仿效。美国学者迪玛乔和鲍威尔（DiMaggio & Powell，1991）区分了制度同构的三种机制：强制性趋同源于政治影响和合法性的要求；模仿性趋同源于对环境不确定性的反应；规范性趋同与专业化程度的增强有关。布什与乔根斯（Busch & Jorgens，2005）也提出了国家间政策集中的三种路径：对国内实践进行的合作协调化，由于遵守国际法律协定或者超国家法律；强制性实施某一政治行为，通过经济、政治甚至是军事的威胁、干涉或者制约的方式进行；相互依赖但非一致的行为扩散，通过跨国的模仿、仿效或

者学习进行。

可将影响政策趋同的因果机制归纳为以下五个核心因素，见表4。

表4 政策趋同的机制

机制	刺激因素	回应
1. 强制	政治需求或压力	服从
2. 国际统一	国际法规定的法律义务	遵守
3. 规制竞争	竞争压力	相互调适
4. 跨国交流		
教训吸取	问题压力	对其他地方模式的移植
跨国问题解决	同等问题压力	共同发展模式的采纳
效仿	对一致性的寻求	对广泛应用模式的复制
国际政策推广	合法性压力	对推荐模式的采纳
5. 独立解决问题	同等问题压力	独立但类似的回应

资料来源：Holzinger & Knill，2005。

（1）强制（imposition）。这一机制在很多标题下被提及，在玛乔和鲍威尔（DiMaggio & Powell，1991）看来，“强制性同构来自于组织对依赖于它们的其他组织施加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压力”。依赖性组织易于采纳控制了其核心资源的组织的行为模式，资源被用作一种激励或惩罚。古勒尔（Guler，2002）与玛乔和鲍威尔的观点类似，古勒尔将强制性同构定义为“来自于政治影响的一致性压力”，这与我们所理解的强制性趋同非常接近。当外部政治主体强迫一个政府采纳某一特定政策时，强制性趋同出现了。这预设了权力的不对等，经常存在为了经济资源的交换而进行的政策采纳。有两种典型情况：一是某一国家对另一国家进行政策上的单边强加；二是由国际组织的条件限制所致。第一种情况可能发生于战后，不会导致影响深远的趋同，几乎不会涉及数量较多的国家。第二种情况更为普遍，经常涉及到较多数量的国家。另外，构成条件限制的政策通常广泛应用于国际组织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经济政策和人权政策。

(2) 国际统一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如果国家遵守国家法或超国家法律所规定的正式义务,那么国际统一机制会导致国家间趋同。国际统一机制建立在国家遵守国际义务的基础上。统一指国家合作的具体结果,也就是国家政府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而被迫采纳类似政策和项目所形成的集群。国际统一以及更为普遍的国际合作预设了相互依赖或者外部性的存在,这推动政府通过国际组织内部的合作来解决一般问题,因此为了群体的利益而牺牲部分独立性。^① 制度安排一旦建立,将会限制并修正国内政策选择,即使这一制度安排长期受到其成员国的挑战与改造。然而,由于成员国自愿加入国际合作并且积极影响组织决策和安排,国际统一的影响不会形成等级程序,而更可能被解释为“协商移植”(Dolowitz & Marsh, 2000)。

(3) 规制竞争 (Regulatory competition)。欧洲和全球市场日益增多的经济融合带来的规制竞争也被认为是驱动不同国家政策调整的重要因素。由于国家间存在竞争压力,它们会相互协调内部政策,由此国家规制竞争带来趋同。规制竞争假设国家间存在经济整合。尤其是随着欧洲和全球市场的整合度的增强以及国家贸易壁垒的消除,国家商品、工人和资本的流动对民族国家施加竞争压力,要求其重新设计国内市场规则以避免限制国内工业竞争的规制问题。压力来自于其他地方经济主体转变其活动的潜在威胁,促使政府降低其规制标准。就此而言,规制竞争可能导致朝向底部的竞争,意味着政策趋同^②。然而,理论工作^③也表明,驱动政策朝向两个方向分散前进都具备条件,包括政策的类型(产品或程序标准)或者是利益的存在,而不是国家政治较易。

(4) 跨国交流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在这一标题下我们总结了一些不同但相关的机制,包括教训吸取 (Lesson drawing)、跨国问题解决 (Transnational problem-solving)、效仿 (Emulation of policies) 以及国际政策推广 (International policy promotion)。与其他模式不同,跨国交流机制的运作纯粹是建

① 如 Drezner, 2001: 60; Hoberg, 2001: 127。

② 如 Hoberg, 2001: 127; Simmons & Elkins, 2004; Drezner, 2001: 57-59。

③ 如 Vogel, 1995; Kern et al., 2000; Holzinger, 2002; 2003。

立在国家间交流的基础上。其他机制预先假定了如政治压力（强制）、法律义务（统一）、竞争压力（规制竞争）或者是并行问题压力（独立问题解决）。交流可能在这些机制中也发挥了作用，但并没有成为导向趋同效果的主要因素。在交流机制下总结的不同机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除了信息交换和交流，它们没有预先假定任何东西，这一特点将它们与其他机制区分开来。另外，关于其趋同效果的理论期望是非常类似的。

“教训吸取”概念的提出者是罗斯（Richard Rose），罗斯把政策学习视为教训吸取，即“面对相同的问题，决策者会从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中撷取成功的经验或吸取失败的教训，作为本国之参考或借鉴”（Rose，1991）。罗斯认为，政策教训建立在自愿程序的基础之上，其中政府 A 学习政府 B 对共同问题的解决之道，包括积极的教训吸取（做什么）与消极的教训吸取（不做什么）。教训吸取并不必然是对其他政策的复制，而是可能采取多种形式，从混合移植到全新模型设计。因此，教训吸取不完全等同于政策趋同。耶夫拉（Meseguer Yebra）提出了与教训吸取相近的概念——贝叶斯学习。这是一种理性的、经验基础上的学习。政府被假定为完全理性的学习者（Yebra，2003）。

“跨国问题解决”也假定存在理性学习的过程，不过它并不是双边移植的结果，由于面对着相似的国内问题而察觉到共同问题的解决需要合作努力，由此驱动了跨国问题解决机制的发生。跨国问题解决典型地发生于跨国精英网络或认知社区中，这一网络由享有共同信仰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对于获取评价新知识的标准和手段有共同的认识。共同的教育背景和规范促进了这一集群中共同政策模型的合作发展（DiMaggio & Powell，1991）。

“政策效仿”仅仅是出于与其他国家一致的想法，而不是为了给既定问题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效仿经常意味着对其他地方政策的简单复制。以下几个因素会推动对一致的寻求：首先是已经采用一定政策的国家的数量的影响，广为采纳的政策成为处理某一问题的明显方式；其次是组织希望通过拥有在更广阔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中被证明有效的形式和实践而提升其社会合法性（DiMaggio & Powell，1991）；第三是行动主体“不被落下”的心理因素导致；第四是时间压力等理性考虑。

“国际政策推广”是由于国际组织对某一政策模式的推广，对政策主体形成压力导致。跨国政策移植受到非绑定的国际协议或者包含广泛的目标和标准的主张所推动，这些目标和标准是国家政策希望实现的。对最好的实践（标杆）的回顾与确认以及按照绩效对国家政策的排序，也对政策移植施加了制度化影响。国际组织，例如欧盟（European Union）、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或者世界银行（World Bank），也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以及跨国利益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5）独立问题解决（Independent problem-solving）。一些国家在面临同等问题压力时，作出相似但独立的回应，这就是独立问题解决机制。与政策移植或政策扩散不同，在这种机制下行动主体不是针对其他主体行为作出的回应。独立问题解决机制预先假定国家之间不存在交流，也就是说，它们并不知道其他国家政策选择的信息。

（二）影响因素

除了上述机制在政策趋同中发挥影响外，还有一些影响因素在对其发挥着促进或阻碍作用。霍尔兹因格尔与尼尔将影响因素分为国家因素、国际因素与政策特征三部分，即政策环境与政策两大块。克恩等（Kern, 2000）也做出过类似的分类，而德雷兹内（Drezner, 2001）将其中的经济与意识形态分为两类影响因素。虽然经济与意识形态指称不同的维度，但这两类压力主要与国际因素相关。具体而言，可将政策趋同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以下几类：

（1）政策环境的相似性。这主要涉及国家特征，或者更为具体点说，是国家的相似性。人们认为政策发展的趋同化更易发生于那些制度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国家。政策被移植以及正确被执行仅仅因为它们适合现存的制度安排。另外，文化相似性在促进跨国政策移植中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对相关政策模型的研究中，研究者期待决策者关注那些与其具有相似文化结构的国家的经验。最后，在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上的相似性已被确认为是促进跨国政策移植的因素。趋同缺失的

一种典型的解释是“国内条件发挥着过滤器的作用”以及国家间差异的存在。^①民族国家仍然是关键主体，即使是在全球化与欧洲化的进程中。^②一些作者强调说，即使欧盟面对国家制度的差异也“没有足够的马力”去促进趋同。^③

(2) 压力等外部因素。其中意识形态压力与经济压力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外部力量。例如，特夫斯等 (Tews, 2003) 提出环境政策中的高效提升与增长的合法性，哈克尔 (Hackl, 2001) 提出教育政策中的国家骄傲与竞争力，哈里森等 (Harrison, 2002) 提出了卫生政策的科学社区的重要性，这些都在暗示着意识形态压力。经济压力也在被暗示。例如，科尔曼 (Coleman, 2001) 认为农业政策趋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竞争。对资本和贸易的竞争经常被认为是政策自由化的主要理由，在这一方面，西蒙斯与埃尔金斯发现一个国家的政策创新能改变其他国家的结果。同样的，马丁与施耐德 (Martin & Schneider, 2004) 认为朝向不那么严格贸易政策的趋同受到所谓的“领导者”与“追随者”互动的影 响。布鲁内与加勒特 (Brune & Garrett, 2000) 将养老金私有化政策的扩散归于先进国家影响力大于全球化或者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

(3) 政策特征。这里，政策本身已经被认定为影响趋同的因素之一。关于研究中所考察的不同的政策领域，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是否政策本身也能解释研究中部分的多样性。相对于其他政策领域而言，一些政策领域是否更易于趋同？如果是这样，趋同常常在何种层次和程度上发生？一种观点认为，国内行动团体之间具有激烈分配争论的政策将会扩散，与分配争论较少的管制政策相比，其趋同程度要轻微一些。另一种观点认为政策特征对趋同的影响集中于政策维度的差异。例如，霍尔 (Hall, 1993) 区分了政策形式、政策工具与环境，认为观念上的变化最为困难，因为观念是深植于国内主体的主流信仰。相反，政策工具甚至政策环境可被调整，而不必然要求观念上的改变，因此相对于政策范式而言，政策维度上的趋同更容易发生。然而，这一观点并不是完全站得住脚。

① 如 Busch, 2002; Bissessar, 2002; Bleiklie, 2001; Coleman & Grant, 1998; De Bandt & Mongelli, 2000; Eyre & Lodge, 2000; Harrison, 2002; Howlett, 1994; Lutz, 2004。

② 如 Brune & Garrett, 2000; Ferrara, et al., 2001; Guler, et al., 2002。

③ 如 Fernández, 1994: 52; Kerwer & Teutsch, 2001; Nicoletti & Scarpetta, 2003。

关于趋同的解释因素，这样说也许是公正的，趋同的原因通常基于国际因素（经济或者意识形态），而有限趋同或多样化的原因则经常根源于国家内部（制度）因素，趋同的政策本身的原因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五、政策趋同理论研究的价值分析

虽然 2005 年乔丹（Andrew Jordan）提出了政策趋同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时尚还是一个新的焦点的疑问，但后来的一系列研究都体现出对政策趋同的持续关注（Jordan, 2005）。在对政策趋同研究的重要性有充分认同的前提下，西方国家关于政策趋同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具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如政策趋同的概念被赋予动态的界定，相关的理论维度是时间而不是空间，这样将政策趋同与静态的相似性区分开来，而随着政策趋同研究的发展，政策趋同的概念与政策创新、扩散与移植等相关概念都已成为既定的概念。在政策趋同的维度上，已将政策总体趋同与政策不同维度的趋同在理论上区分开来，虽然现有“许多经验研究在政策要素比较方面不那么精确，一些研究没有区分不同的维度，而是对‘政策’总体进行比较”（Heichel et al., 2005）。另外，对于政策趋同的路径以及影响因素则更是研究的热点，现有研究纷纷从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政策领域中探讨影响趋同的多方面因素，实证研究大多以此为中心议题。可以说，认为政策趋同成为比较政策研究中的中心议题的观点毫不夸张。

但贝内特关于政策趋同研究现状的结论至今仍然适用。“趋同并非一个系统连贯的理论。相反，它是反映了多样化的理论与方法论观点的不同趋势以及过程的综合体。”（Bennett, 1991）至今，政策趋同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研究领域，虽然欧洲学者多次呼吁进行相关研究，但目前仍由美国比较政治学所主导。关于政策趋同的研究目前存在以下不足，需要反思。第一，关于政策趋同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实证研究，而单纯的理论建构较少，理论突破不够，如很多研究仍然在沿用贝内特 1991 年的研究分类。第二，西方国家关于政策趋同的研究都是关注国际层面，即多讨论国家间政策趋同的，而对于其他层面的政策趋同较

少关注。事实上，对地方层面的政策趋同的研究也是一个有意义的贡献。第三，在其实证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海歇尔等（Heichel et al., 2005）注意到，“大多数研究专门针对欧盟或者 OECD 国家，关注发展中国家或者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仅仅是例外”。研究范围受限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缺乏相关数据，尤其是定量分析的缺乏。在研究领域上，全球化相关的领域如财政、经济和社会政策受到较多关注，这些是具有跨国特征以及高度外部性（如环境政策领域）的领域；而诸如教育、卫生、农业、移民或者电子通信技术的政策领域少有被涉及。

尽管现有研究仍有待深入，但不会削弱对政策趋同这一主题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学术层面上讲，对政策趋同的研究代表了对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贡献，而且也补充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政策观察与公共政策研究。另一方面，政策趋同研究融合了多学科的观点，可以成为连接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桥梁。国际关系研究更为重视国家之间的互动与政策系统的开放程度对政策的影响，而比较政治学往往在一国封闭系统中考察内部因素。而事实上，政策供给影响因素的强此弱彼越来越失去意义了。全球化带来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的变化，各国政策系统更具开放性与兼容性，孤立、封闭的决策系统不合时宜，但政策供给也并非就意味着国家主权的丧失。政策趋同理论在促进政策系统之间关系的同时，也强调对政策系统内部的原因探寻，从而将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学研究连接起来。

政策趋同研究的理论贡献还在于为一些新兴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启发，这些领域或者是之前没有被密切关注过的，或者是以前没有作过系统研究的。这些领域包括：第一，欧盟及其同构化。大量的文献探讨欧洲公共行政与国家内部在不同方面趋同的程度，但这些文献没有与趋同研究联系起来。第二，政策执行。最近，对政策执行的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视角（丁煌、定明捷，2010），由于执行与趋同文献都关注政策产出与结果，因此存在大量的融合（cross-over）研究的空间，政策趋同能为政策执行的研究提供启发。第三，政策扩散与移植。政策扩散、政策移植与政策过程密切相关，但它们促成带来更大相似性的程度正是趋同学者研究的源泉。研究政策移植必然关注其效应，政策趋同理论扩展了对政策移植效应的关注视野，丰富了政策移植的理论框架。第四，区域协调的新模式。随着世

界范围内民主化浪潮的兴起以及新的治理模式的频繁创新，出现的问题是，区域之间实际上有没有达到趋同的预期程度？现有文献更多关注新模式的设计与采纳，而政策趋同理论则将视角转向其相对效应。第五，区域整合，尤其是欧盟整合。欧盟学者的一个古老争论是，关于整合是否遵循一个渐进的、平滑的路径（如新功能主义），还是一个更为阶梯式的方式（如政府间关系）？现有研究还远未找到答案。或许政策趋同与执行文献能有助于对传统论点进行联系整合进而做出判断，因为欧洲整合在欧盟层面发生，但同时也在成员国内部的国家层面上发生。虽然以上第一和第五个方面都与欧盟的研究相关，但事实上，欧盟作为一个“巨大的政策平台”（Radelli, 2000）、一个政策供给的协调机构，其与成员国之间的互动以及政策效果的变量分析对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从现实层面上讲，随着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以及信息交流进入高速通道，政策趋同的现实可能性增加，对政策趋同的解释也日益凸显出其重要性。青木昌彦（2001）在其《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就提出了关于制度趋同的有趣的问题：国家性或地区性的制度安排是如何适应这些环境变化的强有力的影响的？尽管各种各样的制度互补性使得制度安排倾向于稳固和具有惰性，制度会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换言之，不同区域的制度安排是否会多少变得大致类似？全球性制度安排会不会走向均质化，由跨国组织和规则主导，而不论我们是否愿意？全球性制度安排是否应该走向均质化？事实上，对政策趋同问题的关注是时代背景使然。全球化、市场化与信息化的发展直接推动政策趋同现象的发生，使得政策趋同的问题被学者广为关注并被热烈讨论。全球化时代资源与信息流动性的增强带来了治理问题的趋同，如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能源短缺等，往往会促使处在经济发展相似阶段的国家采用相似的解决方案来处理它们的共同问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具有同构性，虽然各国在具体的经济制度安排上存在差异，但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等是相同的，而且人类基本的需求、基本的价值取向以及实现这些价值的基本方式却都是相通的，各国所走过的道路和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互相借鉴、学习的，这促进了共通性政策问题的增长以及政策扩散的可能性。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的交

流与扩散，为政策信息的传播以及政策转移提供了技术基础，政策趋同的发生具有可能性与强大的推动力。甚至有学者在考虑导致趋同的时代背景之后，认为最终所有先进的工业化世界都趋于用相同的方式制造和组织经济生活，而没有产生趋同的地方，只因“历史和政治扭曲了趋同而已”（伯杰、多尔，2002）。这种观点虽然有些绝对，但也的确反映了对政策趋同这一现象的关注度。而且正是因为不同观点的存在，更说明了政策趋同研究所具有的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策趋同的研究对中国的政治现实也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目前研究多是基于国际层面，但在一国内部也存在大量的政策趋同的现象。就我国而言，出现了不同领域不同维度的政策趋同，如各地经济发展理念的日渐相似性、招商引资手段的相互效仿带来的趋同、政府决策民主化的扩大与表现形式的相似性，以及各地方保护政策目标与手段的日益雷同，等等。自从改革开放后中央向地方放权而使得地方政府获得了一定的自主空间，加上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具备了追求独立利益的能力，地方政府逐渐演变成追求政绩最大化及潜在制度收益最大化的“政治企业家”。问题是，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各地“政治企业家”的行为是否一定趋同？不同领域政策趋同遵循何种路径？不同领域政策趋同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最终是否必然会出现趋同而不是趋异？等等。西方学者关于政策趋同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认识和分析工具，有助于对中国地方之间的政策趋同进行解释，进而推动政策供给的优化。

六、结语

西方国家政策趋同研究的高速发展与欧洲整合以及国际化对国内的影响力的增强相伴随，目前为止，已形成相对完善的理论框架。可以说，政策趋同也是全球化所催生的一个研究主题。政策趋同由于其对多学科、多视角知识的融合，而被广为应用在多个领域，也提供了研究视野、知识以及方法等方面的启示。但政策趋同研究的繁荣并非一定意味着政策趋同的增加，事实上，大量的实证研究^①表

^① 如 Dolowitz, 1997; Ferrara, et al., 2001。

明,某些领域只存在有限趋同,某些领域甚至可能出现政策差异的扩大。当然,从一定意义上看,政策趋异也是政策趋同研究的一个领域。另外,政策趋同的出现并不必然代表政策系统外部因素的影响,由于偶然因素在相对独立的政策主体内部也可能生作出类似的政策。政策趋同可能是受到外部互动的结果,但也可能是完全独立的偶然行为导致。最后,相同的政策问题并非必然导致相似的解决方法,也即政策趋同。认为对某一特定问题只有唯一一个最优解决方案的观点很容易陷入经济或者技术决定论的误区,而且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进行验证的不确定的论断。与此相关的一个具有诱惑力但错误的假设是:政策趋同是国家主权丧失的表现,其实,政策趋同并非破坏国家或者政策主体的自主性。

综观对政策趋同的研究,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对政策趋同的轰轰烈烈的思考,另一方面却是我国对这一领域的忽视,这也是我国政治学、公共政策学等后发领域所不可避免的尴尬。我们只有保持对西方研究成果的敏锐观察力,同时加强与西方政策研究学者的交流与对话,在对其成果进行吸收和引进的同时,注意本土化改造与创新,以此推动我国政治学行政学的发展,同时拓展相关学科的研究宽度与深度。

参考文献

- 苏珊·伯杰、罗纳德·多尔(2002). 国家的多样性和全球的资本主义. 重庆:重庆出版社.
- 丁煌、定明捷(2010). 国外政策执行理论前沿评述. 公共行政评论, 1.
- 埃弗雷特·M. 罗杰斯(2002). 创新的扩散. 辛欣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青木昌彦(2001). 比较制度分析. 周黎安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 Fernandez, S. A. (1994). Convergence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Resilience of National Institutional Designs in Spain and Germany.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4 (1): 39 - 56.
- Bennett, C. J. (1991). What is Policy Convergence and What Causes I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s*, 21 (2): 215 - 233.
- Bissessar, A. M. (2002). Globaliz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in the Commonwealth Caribbe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68: 113 - 135.

- Bleiklie, I. (2001). Towards European Converg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13 (3): 9 – 29.
- Brickman, R., Jasanoff, S. & Ilgen, T. (1985). *Controlling Chemicals: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rooks, S. M. (2004). *Interdependent and Domestic Foundations of Policy Change: the Diffusion of Pension Privatization around the World*.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Montreal, March 19th.
- Brune, N. & Garrett, G. (2000). *The Diffusion of Privatiz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Annual Meeting, APSA, Washington D. C., August 30th – September 3th.
- Busch, A. (2002). *Divergence or Convergence? State Regulation of the Banking System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per presented at Workshop on Theories of Regulation, Nuffield College, Oxford, May 25th – 26th.
- Busch, P. & Jorgens, H. (2005).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Policy Convergence: Explaining the Spread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novation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2 (5): 860 – 884.
- Castro, E. & McNamara, K. R. (2003). *The Diffusion of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Interdependence, Diffusion and Sovereignty’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March 7th – 8th.
- Coleman, W. D. (1994). Policy Convergence in Banking: a Comparative Study. *Political Studies*, 42: 274 – 292
- Coleman, W. D. (2001). Agricultural Policy Reform and Policy Convergence: an Actor – centered Institut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Research and Practice*, 3: 219 – 241
- Coleman, W. D. & Grant, W. P. (1998). Policy Convergence and Policy Feedback: Agricultural Finance Policies in a Globalizing Era.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4: 225 – 247
- De Bandt, O. & Mongelli, F. P. (2000). *Convergence of Fiscal Policies in the Euroarea*. Working Paper 2000/20. Frankfurt: European Central Bank.
- DiMaggio, P. J. & Powell, W. W. (1991).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 Fields. In DiMaggio, P. J. & Powell, W. W.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olowitz, D. P. & Marsh, D. (1996). Who Learns What from Whom: a Review of the Policy Transfer

- Literature. *Political Studies*, 44 (2): 343 – 357.
- Dolowitz, D. P. (1997). British employment policy in the 1980s: learning from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10 (1): 22 – 42.
- Dolowitz, D. P. & Marsh, D. (2000). Learning from Abroad: the Role of Policy Transfer in Contemporary Policy Making.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13 (1): 5 – 24.
- Drezner, D. W. (2001). Globalization and Policy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3: 53 – 78.
- Elkins, Z. & Simmons, B. (2005). On Waves, Clusters and Diffusion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98: 33 – 51.
- Eyre, S. & Lodge, M. (2000). National Tunes and a European Melody? Competition Law Reform in the UK and German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7 (1): 63 – 79.
- Ferrara, M., Hemerijck, A. & Rhodes, M. (2001).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Social Model” in the Global Econom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Research and Practice*, 3: 163 – 190.
- Ganghof, S. (2004). *Konditionale Konvergenz, Standortwettbewerb, Policy – Lernen und politische Institutionen in der Steuerpolitik von EU – und OECD – Ländern*. Paper presented at Sources of Cross-national Policy Convergence (DVPW), Hamburg, April 23th – 25th.
- Gemmell, N. & Kneller, R. (2002). *Fiscal Policy, Growth and Convergence in Europe*. European Economic Group, Working Paper No. 14/2002.
- Gornick, J. C. & Meyers, M. K. (2001). Lesson – drawing in Family Policy: Media Report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about European Developmen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Research and Practice*, 3: 31 – 57.
- Guler, I., Guillén, M. & Macpherson, J. (2002). Global Competi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Diffusion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ISO 9000 Quality Certificat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7: 207 – 232.
- Hackl, E. (2001). *Towards a European Area of Higher Education: Change and Convergence in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Working Paper RSC No. 2001/09, San Domenico: EUI.
- Hall, P. A. (1993).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25: 275 – 296.
- Harrison, K. (2002). Ideas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 – sett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gulation of

-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15 (1): 65 – 96.
- Harrison, S., Moran, M. & Wood, B. (2002). Policy Emergence and Policy Convergence: the Case of “Scientific – bureaucratic Medic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 (1): 1 – 24.
- Heichel, S., Pape, J. & Sommerer, T. (2005). Is there Convergence in Convergence Research? An Over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Policy Convergenc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2 (5): 817 – 840
- Hoberg, G. (2001). Globalization and Policy Convergence: Symposium Overview.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Research and Practice*, 3: 127 – 132.
- Holzinger, K. (2002). The Provision of Transnational Common Goods: Regulatory Competition for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In Héritier, A. Ed. *Common Goods: Reinventing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Holzinger, K. (2003). Common Goods, Matrix Games, and Institutional Solu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9: 173 – 212.
- Holzinger, K. & Knill, C. (2005). Causes and Conditions of Cross – national Policy Convergenc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2 (5): 775 – 796.
- Howlett, M. (1994). The Judicialization of Canadian Environmental Policy, 1980 – 1990: a Test of the Canada-United States Convergence Thesi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7 (1): 99 – 127.
- Howlett, M. (2000). Beyond legalism? Policy Ideas, Implementation Styles and Emulation – based Convergence in Canadian and US Environmental Policy.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20 (3): 305 – 329.
- Jordan, A. (2005). Policy Convergence: a Passing Fad or a New Integrating Focus in European Union Studie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2 (5): 944 – 953
- Kern, K., Jörgens, H. & Jänicke, M. (2000). Die Diffusion umweltpolitischer Innovationen: Ein Beitrag zur Globalisierung von Umweltpolitik. *Zeitschrift für Umweltpolitik und Umweltrecht*, 23 (4): 507 – 546.
- Kerr, C. (1983).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Convergence or Continuing Divers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erwer, D. & Teutsch, M. (2001). Elusive Europeanization: Liberalizing Road Haulage in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8 (1): 124 – 143.

- Knill, C. (2005). Introduction: Cross – national Policy Convergence: Concepts, Approaches and Explanatory Factor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2 (5): 764 – 774.
- Liefferink, D. & Jordan, A. (2002). *The Europeanisation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orking Paper 2002/14. Nijmegen: NSM.
- Lutz, S. (2004). Convergence within National Diversity: the Regulatory State in Finance.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24 (2): 169 – 197.
- Marsha, D. & Sharman, J. C. (2009). Policy Diffusion and Policy Transfer. *Policy Studies*, 30 (3): 269 – 288.
- Martin, C. & Schneider, G. (2004). *Foreig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Regulatory Competition and Policy Convergence: Global Trends, Regional Differences*. Paper presented at Sources of Cross – national Policy Convergence (DVPW), Hamburg, April 3th.
- Meseguer, Y. C. (2003). Learning and Economic Policy Choices: a Bayesian Approach. EUI Working Paper RSC No. 2003/5,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San Domenico.
- Montanari, I. J. (2001).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Old and New Convergence of Social Insurance Since 1930.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2 (3): 469 – 494.
- Newmark, A. J. (2002). An Integrated Approach Policy Transfer and Diffusion. *The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19 (2): 151 – 178.
- Nicoletti, G. & Scarpetta, S. (2003). Regulation,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OECD Evidence. *Economic Policy*, 18: 9 – 72.
- Radelli, C. M. (2000). Policy Transfer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s a Source of Legitimacy.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13 (1): 25 – 43.
- Rose, R. (1991). What is Lesson Drawing?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1 (1): 3 – 30.
- Saint – Arnaud, S. & Bernard, P. (2003). Convergence or Resilience? A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Welfare Regimes in Advanced Countries. *Current Sociology*, 51 (5): 499 – 527.
- Seeliger, R. (1996). Conceptualizing and Researching Policy Convergence. *Policy Studies Journal*, 4: 287 – 306
- Simmons, B. A. & Elkins, Z. (2004). The Globalization of Liberalization: Policy Diffus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 171 – 189.
- Stone, D. (1999). Learning Lessons and Transferring Policy across Time, Space and Disciplines.

Politics, 19 (1): 51 – 59.

Tews, K. , Busch, P. O. & Jörgens, H. (2003). The Diffusion of New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2 (3): 569 – 600.

True, J. & Mintrom, M. (2001). 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Policy Diffusion: the Case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5 (1): 27 – 57.

Vogel, D. (1995). *Trading Up: Consumer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olf, H (2002).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nvergence of Social Expenditure in the European Union*.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the GW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 Washington D. C. .